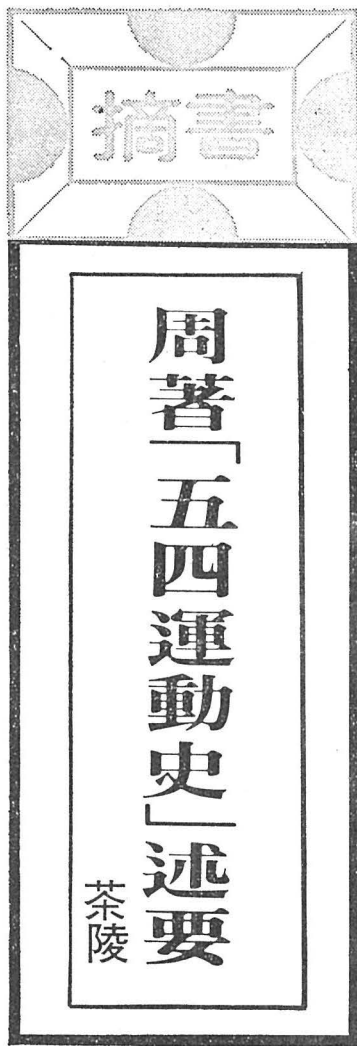


更進一步的發展（下）

積極支持學生的並不僅限於商人及店員，上海城市工人在同一天舉行了前所未有的同情大罷工。罷工首先起於紡織工人和印刷工，然後蔓延到金屬工人和其他工羣。中國當時由於欠缺聯合和有效的勞工組織，罷工的開始日期也就因工廠之不同而有異，延伸在六月五日到十一日之間。捲入罷工的人數未得其詳，有些估計說在六、七萬之譜，又有九萬人以上之說。

根據可得的消息報導，罷工至少曾在四十三家工廠、公司和公用事業協會裏舉行。其中包括七家紡織廠、七家金屬工廠、八家公用事業如公車電話電報等公司、七家運輸交通如鐵路（京滬和滬杭線）與汽輪等公司，



（五）

其他還有印刷、紙業、石油、煙草和火柴等工廠。此外，飯店工人、油漆工、木匠、泥瓦匠、司機和清道夫等加入了行動。估計有一百家公司和工廠受到罷工的影響。

罷工的重要性不在於它的經濟結果，而在於它的本質。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政治的和愛國的罷工，工人的目的並非要求加薪或改善待遇，他們在抗議中國和日本政府。罷工期間，工人曾和經理談判，計畫致力於維持秩序或必要的公共服務。除了一些日人擁有的工廠外，工人和經理之間並無嚴重的衝突。即在日人的工廠中，管理部門也未向工人的動機挑戰。在大多數的事例裏，中國人當家的有關工廠和公司，都未對罷工提出實際的反對。我們可以如此解釋：這次罷工是城市工人積極支持學生的一項宣告，大多數的雇主對此都默予同意。罷工在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反映在下列各事件中：工人於六月九至十一日在上海舉行羣衆示威，雖然並非所有的上海工廠工人都參加了罷工，這運動業已喚起一般勞工對政治的極大興趣。上海的一個勞工組織甚至在六月六日致電駐節南京的江蘇省督軍李純，建議他宣布該省脫離北京政府而獨立。

工商組織以外的衆多市民也加入了罷工。這次罷工的影響力遍及社會各低層，連乞丐、小偷、妓女和歌女都不例外。稍後郵局職員、警察和救火員也威脅說：假如政府不改其對學生的態度，他們就要停止工作。

當大逮捕只是造成學生更強烈的反對時，北京政府學習到一個教訓。代理教育總長袁希濤面對來自軍方團體和學生及社會的雙重壓力，發現在兩難中無路可走，只好提出辭呈。同時內閣因為遭到如此強烈的抗議，立場再度動搖。政府逮捕一千多名學生的當晚，內閣在總理的私寓中開會，決議接受袁的辭職，並任命另一次長傳嶽榮接代教育總長。從這時起，政府放棄了所有藉由武力來解決學生問題的希望，開始試用說服的策略，但仍不放鬆其堅持的外交政策和留任三名被控官員的決定。政府在六月五日示範了這新策略的兩項行動：代理教育總長的替換打開了妥協之路，前北大工科學長胡仁源也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不過屬於臨時性質，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蔡元培的辭職是否已被接受。然而，學生們將這些變動解釋為政府仍欲控制大學的明證。

新的代理教育總長立即建議兩項措施以解決學生問題：（一）請求軍警從學校建築物周圍撤出；（二）經由學校當

局和教育部，要求學生回校上課，此後軍警將不參與對學生的談判。據此，所有軍警於六月五日下午從校園撤出。政府的突然退却是受到上海準備罷市罷工的消息所影響，商人罷市和工人罷工的深遠影響是不容低估的。六月五日以後北京的緊張氣氛，每一個人都能明白感覺到。

但在軍警撤退以後，學生們拒絕離開校中的監獄，直到某些要求獲得滿足。當校舍被用來做監獄時，學生在校內開始組織自己，現更進一步的採取自我防衛。他們馬上打電報給各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勞工團體、學校和全國報界，控訴政府「非法蹂躪教育，破壞司法，侵犯人權」。他們同時向北京政府提出四項要求：（一）三名賣國賊必須免職；（二）學生言論自由須獲保證；（三）獲釋時應被允許在北京街上遊行；（四）政府應為逮捕之事公開道歉。其中第二項要求只是原則問題，因為在大逮捕以後，北京學生已經繼續在街頭演說，並呼籲只購買國貨，此舉並未受到政府進一步的干涉。

政府現在變得像逮捕和監禁學生時那樣，急著要放走他們。六月七日，教育部派四名官員到獄中，以「非官方代表」的身分勸導學生出獄，可是失敗了。第二天，政府派兩名「和平代表」，其中一位是國務院的秘書，說明政府承認錯誤並道歉。警察也道歉，並派車到監獄門口負責送回學生。許許多多社會團體也派了慰問的代表，總數達數千之眾，他們充當學生與政府之間的調人。

在此情況下，自行入獄的學生於六月八日勝利地走出學校監獄，圍繞他們的是鞭炮和歡呼，又受到同學和市民所予羣衆大會和遊行的熱情歡迎。大逮捕就這樣以一場鬧劇告終，並使政府成為笑料，正如西方觀察家們所說，在中國這通常是一種對政府的毀滅性發展。

但是事情並未解決，因為政府尚未接受所有學生的要求。許多城市裏仍有學生、商人、工人和其他社會團體，在繼續抗議政府的親日政策。上海的罷市罷工也未被捕學生的獲釋而停止，相反地各種不同的社會力量業已合併，以便共同行動對付政府。六月六日，總數一千四百七十名的商人、工人、學生、報業及其他各界代表，在上海縣商會會館舉行全國各界聯合會的一項集會，許多經濟、政治與社會領袖出席。代表們要求北京政

府嚴厲處分賣國賊，否則繼續罷市罷工，商人也將拒絕納稅以示抗議。

聯合會發表了兩篇宣言，其中之一是對在華的外國人而說的：

此次上海市民罷市的真意，是在喚醒北京政府，取消喪失主權的不正當條約，懲辦應負責任的外交和軍事當局。我們絕不損害到各友邦國民的一絲一票，這次罷市是中國人民最和平正當的愛國表示。希望各友邦國民瞭解我們的苦衷，並主持正義，給我們精神的支持。

這項宣言顯然在答辯日本政府所說的，反日活動含有排外運動在內。另一項宣言中，聯合會呼籲上海市民力維秩序，它解釋該會的目的是要合法地爭取自由。城內某些地區，童子軍和學生出來協助警察維持秩序。團結的意識遍布社會各階層，甚至流氓、盜賊和地下幫會如「青紅幫」裏人，都表達了對運動的效忠，並協助維持和平和秩序。結果，犯罪率一向高如芝加哥或紐約的上海市，在罷市期間不見有何騷亂。

罷市和罷工迅速擴展到其他城市。南京的商人從六月六日開始全部歇業，兩千四百多名學生參加了活動，結果與軍警相搏，許多學生受傷。六月六日到九日，長江沿岸的城市商人相繼罷市，沿岸的交通停頓。華北也捲入運動中。北瀋鐵路上的唐山車站、京漢鐵路上的長辛店車站工人都罷工。這些地方的工人同時舉行了示威遊行，勞工組織已在萌芽。

所有這些罷市罷工都對北京政府施加了大壓力，而最嚴重的吹打來自天津，它在經濟上控制著首都。六月五和六日，天津學生兩度遊行示威，抗議大量逮捕北京學生及壓制言論自由。六月九日，學生聯合會在天津主持了羣衆大會，有兩萬多名市民參加。天津商會在學生和市民的勸說及強制下，決定從十日起發動罷市。九日下午該項消息傳抵北京，首都商界立刻激起金融恐慌的心理反映，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的鈔票突然在市場上不能流通，商人也想暫停營業。政府至此開始理解到情勢的嚴重，六月九日，國務院秘書長郭則澐把總統接

受曹汝霖辭職的消息帶到北大學生聯合會，並謂命令正在印刷中即將公告，但是其他兩名官員不能去職，以免引起中日關係的受激。此後不久，天津傳來的消息變得更壞，工人也將於十日追隨商人而罷工，假如局勢延續的話，全市所有的公用事業都要停擺。一羣中國銀行家同時警告政府：「假如今天不解決問題，明天金融市場就無法維持。」謠言在各地傳佈，有謂軍隊恐怕不再可信賴者，甚至傳說西山附近的軍團要開向北京，站在學生的一邊。北京學生業已決定，六月十日早上大隊人馬行進到總統辦公室，呼籲他採取行動罷免三名官員。

內閣面對此等危機，於九日深夜召開會議，決定接受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辭職，命令分別在十日上午和下午公布。上海總商會曾於九日和十一日兩度試圖中止罷市，但因免職一事的不定而延緩了行動，直到十二日上午才停止罷市，總計持續了七天有餘。一兩天後其他各地的罷市和罷工也告終止，學生們贏了這一場較大的戰鬥。

但是驅掃賣國賊並非運動的唯一目標。其他的要求如拒絕簽凡爾賽和約、留任蔡元培為北大校長等迄未達到。雖然「罷學」已停，各社團和學生仍堅持其他要求。在公布三名官員免職令的當天。徐世昌總統提出了他自己的辭職書，但為國會所拒絕。然因政府處理學生問題和上海和會的失敗，錢能訓獲准於十三日辭去總理兼內務總長二職，財務總長被任命為代理總理。隨後數月裏，因五四事件和其他國內糾紛所造成的艱難處境，總統一直找不到人來組織新聞，殘餘的內閣仍受安福系控制。

三名官員被免職時，學校都已接近放暑假，學生們返家將宣傳帶到鄉下，而一個永久性的學生總部已在上海成立起來。

北京和天津的學生聯合會，曾於五月底邀請上海、南京、太原、濟南、保定、漢口和杭州的學聯會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六月一日，來自各大城和日本的代表在一次非正式的集會中，決議成立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他們在上海的環球中國學生會裏設立一個臨時辦公室，以便進行準備工作。六月十六日該會正式成立，三十多位來自重要省市的學生代表，連同兩百多位來自社會和經濟團體的名人出席了大會。十八日代表們選舉段錫朋

爲主席，何葆仁副之，任期一年。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完善，後來成爲一股政治力量。

六月十一日以後，學生與政府之間的爭執，主要集中於中國是否應在和約上簽字。五月十三日以前，政府對此問題尙無定案。六月四日以後，當巴黎的中國代表團向北京請示此事時，政府的結論是簽字對國家較爲有利，前總理段祺瑞、安福國會、總統和中國外交界的意見一致。結果政府於六月二十四日很自信地指示代表團，倘若他們的抗議終歸失敗，就在和約簽字。

中國民衆聞訊則大爲驚異，包括工商界和勞工在內的許多團體都譴責政府的行動。北京學生聯合會請求總統變更訓令，來自各團體的數百名代表也向他請願，站在總統府前兩天兩夜，不眠不休地哭諫。上海和山東的市民舉行羣衆大會並威脅說，假如政府在條約上簽字，他們將宣布脫離北京政權而獨立。在民衆如此的壓力下，徐世昌總統乃於六月二十五日拍電巴黎的中國代表團，取消稍前之決定，但是這通電報未能在簽字之前送達。廣州政府後來解釋說，訓令的誤時是在故意逃避責任。南方人士宣稱：「北京政府拍出後一電報時，已確知要在和約簽過後才能收到，如此它就可歸罪於代表操之過急，違反訓令。」此說是否屬實自難判斷，不過很明顯的，北京政府是頗不情願發出更改的指令。

巴黎的中國代表都不急望在和約上簽字，因爲此舉無法使山東問題獲致滿意的解決。但是首席代表陸徵祥瞭解北京政府對日的軟弱態度，即使面臨輿論的壓力，仍很難抗拒政權的意旨。在另一方面，代表們飽受中國留學生、工人和旅法華僑的嚴重壓力，他們要求拒絕在此等形式上簽約，並且明告代表們，若其不然則會遭到北京學生處分曹汝霖一樣的待遇。來自中國民衆和社團要求拒絕簽約的電報，爲數多達七千通。在這種情況下，顧維鈞和南方代表王正廷宣稱，即使北京政府堅持此事，他們也決意拒絕簽字。

六月二十八日是和約簽訂日，當天中國留學生、工人和巴黎華僑包圍代表團設在露滴雅旅館（Lutitia Hotel）的總部，以及陸徵祥在聖高德（St. Cloud）的療養院住所。據南方代表說，陸的突然搬離旅館，目的在避免「反對簽字同僚之壓力」。包圍者阻止他們外出簽約，直到法國人鳴砲向全世界宣布凡爾賽和約已簽

時，中國留學生和工人們才離開自定的崗位。在此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於得知他們最後的提案，即「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之提請重議」被大會所拒時，最後一致決定，不經北京同意即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同時，全體代表向總統提出了辭呈。

中國於六月二十八日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標明了五四遊行示威以來羣衆抗議的成果。七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宣布結束所有的罷課。該月間蔡元培應允回任北大校長，月底胡仁源離校長職。九月十二日蔡返抵北京，八天後重任斯職。北京其他大專院校的校長們，也恢復了他們的職務。

關於事件解決的一些問題可分析如後：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五四事件的看法，是將道德、社會和政治問題置於法律之上。對習慣正式法律程序的西方人而言，事件及演展的羣衆行動似乎是無法律根據的。然而，敏銳的西方觀察家如杜威等，則以「社會的道德意識」觀點來看此運動，而不以「純粹法律處置」視之。杜威在一九二〇年春天說：「我很懷疑中國是否會像西方國家那樣，完全遵照法律主義和形式主義。這可能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之一。譬如說，甚至前進分子也少方興趣在立法和決策方面，推行純粹間接和代議的制度。前幾個月裏，民衆自己的意見不斷地決定了事情，經由公共集會和函電，迫使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張。這種個人接觸和大衆意志的立即影響是必要的。」不過更準確的說，五四事件應被理解爲一種反常政局的結果。中國民衆特別是新知識分子，實在對北京政府失去了信心。在此情況下，事件發生或許就是因爲人民不能經由法律程序來改變或控制政府。

思及事件後的全盤發展，我們必須承認新知識分子在對抗軍閥主義和保守主義上，業已獲得了重要的勝利。但在某些層次上，這項勝利只是表面的。中國雖未簽訂對德和約，山東問題依然未決。三名親日官員雖被罷免，繼任者仍都來自同樣親日的安福系，新內閣也受到同樣的軍方團體所控制。五四事件後一年段祺瑞下臺，繼承的軍閥比他更壞。我們必須注意到，段畢竟比其他許多軍閥要來得有節制。不論其動機如何，他也負責推翻過張勳的復辟，並使中國在一次大戰時站在同盟國的一邊。實際上，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對待知識分子的態

度，並不比其他時期軍閥所採行的更為嚴厲。

五四當時的局勢非常有利於運動的成功。彼時段祺瑞未能完全控制北京政府，他的權力受限於馮國璋和曹錕領導的直系軍閥集團，以及溫和派的研究系。另外，事件時期的總統、總理和教育總長都是文官，他們在政府中保持了文武派系力量的平衡。此外中國事實上已南北分立，南方革命政府在新知識分子及民衆的心目中聲譽日隆。新知識分子所以能在五四事件中成功，諸多因素之一，就是在那些政治與軍事集團中達到一種勢力平衡。段祺瑞的威望雖因事件而受嚴重打擊，且不久即被其他更有力的軍事領袖所取代，知識分子却再也難尋有利的環境了。

儘管事實上在這幾個月中，知識分子活動的政治成就有限，他們在其他方面是成功的。這段期間內有更多的新知識分子，較前更緊密接觸了社會的其他團體。過去躲在象牙塔內的學者們，如今走到市集場中。事件帶給他們與商人、店員、城市工人、工業家、職業政客以及政黨幹部連絡的經驗。在這些新奇活動中，新知識分子覺悟到須有「深入民衆，啓發和組織他們」的廣遠計畫。這導致隨即而來的新文化運動之擴展。

書是要讀的

因為書是人生錦囊

要讀書請先讀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 著

30 元